

两赴天竺：徐仁在印度的留学及其科学研究*

陈明

摘要：徐仁是我国著名的古植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在云南大学工作期间，他应印度古植物学权威沙赫尼教授之邀，1944年赴勒克瑙大学留学。1946年被该大学授予博士学位，不久回国。1948年他再度应邀赴印，担任印度古植物研究所副教授兼任代所长，成为近现代中印科学技术交流史以及近现代中国留学史画卷中的罕见代表。1952年徐仁归国。本文搜集海内外的相关档案、日记、报刊、传记、手稿等资料，梳理徐仁两赴天竺的具体经历，揭示徐仁在近现代中印科学技术交流史上所做出的具体贡献，及其在近现代中国留学史中的标杆意义。

关键词：徐仁 沙赫尼 留学史 近现代中印科技交流史

自晚清以来，越来越多的国人开眼向洋看世界。留学欧美与日本者，不绝于途。为吸收、介绍、揭示、融合来自西方与东洋的域外文化，开启近现代中国的思想与文化启蒙之旅，在知识迁移和文化发展的复杂历程中，归国的留学生们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然而在目前逐渐勃兴的中国留学史研究中，关注赴印度的留学生事迹的论文比较少见，赴印留学生们几乎成了被忽略的群体。尽管赴印留学生的规模与影响，无法同赴欧美与日本的留学生相提并论，但是留学生们奔赴历史上曾

* 本文为中国侨联课题“印度华侨华人与留学生在中印人文交流中的作用研究”的成果之一，批准号22BZQK247。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衷心感谢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高天刚研究员、牛帼豪老师对本文提供的帮助！本文也受益于孙启高先生在“科学网”的个人博客上发表的系列相关博文，特此致谢！

与中国有过特殊文化关系的印度，与此相关的留学史也有着自身不容忽视的特点。其中的一些留学生也曾取得过骄人的成就，有过不凡的影响，他们同样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晚清民国时期的赴印人数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除了一般的华侨之外，还有民国政府官方委派或者直接资助的。他们与印度社会各阶层都有接触，甚至建立了比较深的关系。就留学生而言，既有国家公派的赴印留学生，比如1943年10月国民政府公派的十名赴印交换研究生（沈铸、欧阳中庸、卢浩然、魏铨孙等）；也有以不同身份赴印的个人，比如法舫、白慧、法周法师等佛教信徒^①。当时赴印的留学（或游学访问）人群中，大多数人的学习内容乃是以印度文化、宗教或艺术为主体（如谭云山、许地山、徐志摩、徐悲鸿、常秀峰等），只有少量涉及科学与技术。已故的著名古植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徐仁（Jen Hsü，字本仁，1910—1992）就是为数不多的以个人名义赴印学习科学知识的留学生之一。^②与一般尚未登堂入室的年轻留学生不一样，徐仁是已经获评副教授好几年之后再去留学的。从其成就而言，徐仁可以称得上是近现代中印科学技术交流史以及近现代中国留学史画卷中的一名罕见代表。^③

即便是徐仁这样的代表性学者，有关他赴印留学的经历也是晦暗不明的。尽管徐仁对自己在印的经历有简要的描述^④，孙启高在梳理中国古植物学研究史的时候，也特别关注过徐仁的经历^⑤，但仍远远不够细致。郭旭光（Arunabha Ghosh）新近发表的一篇精彩论文《二十

① 参见陈明《新见太虚法师手札与法舫和白慧在缅印的留学经历》（上），《世界宗教研究》2022年第8期，第28—49页；（下），《世界宗教研究》2022年第9期，第39—46页。

② 参见周棉主编《中国留学生大辞典》，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36—337页。

③ 参见李承森《怀念我的导师徐仁教授》，《植物杂志》1993年第3期，第39—41页；刘东生、李文漪《缅怀中国孢粉学和古植物演化学的奠基人徐仁院士》，《第四纪研究》2002年第6期，第493—494页；徐竺声《回忆我的父亲》，《第四纪研究》2002年第6期，第495—496页。

④ 徐仁：《徐仁回忆录》，《徐仁著作选集》，北京：地震出版社，2000年，第313—319页。

⑤ 孙启高在“科学网”个人博客（<http://blog.sciencenet.cn/u/livingfossil>）上发表了“古植物学的故事”系列文章，其中有多篇涉及徐仁的研究经历。

世纪中期中印的跨喜马拉雅科学：沙赫尼、徐仁与泛亚的古植物学》(Trans-Himalayan science in mid-twentieth century China and India: Birbal Sahni, Hsu Jen, and a Pan-Asian paleobotany)，充分利用了印度新德里的尼赫鲁纪念博物馆与图书馆(Nehru Memorial Museum and Library)中收藏的著名古植物学家沙赫尼(Birbal Sahni, 1891—1949, 或译名萨尼、桑尼)档案(编号Birbal Sahni Papers # 164)资料，尤其是其中的中印科学家往来信函，从泛亚洲主义的角度，深入讨论了沙赫尼和徐仁师徒二人在古植物学研究领域所做出的贡献及其重要意义^①。该文对深入了解徐仁在印度的研学经历是十分必要的。对徐仁的学术之旅而言，广泛搜集海内外的相关档案、日记、报刊、传记、手稿、图片等资料，细致梳理徐仁两赴天竺的具体经历，将有助于全面考察徐仁如何在年长一辈的中印科学家们所建构的学术交流圈中受益，揭示徐仁在近现代中印科学技术交流史上所做出的贡献及其在近现代中国留学史中的标杆意义。这也是本文不避“狗尾续貂”之讥，再度爬梳之意所在。

一、徐仁首次申请去印度留学的经过

(一) 徐仁的求学经历及其受聘云南大学

1929年，徐仁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攻读植物形态学与解剖学，比就读外文系的季羨林要早一年。1933年，徐仁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随即被北京大学聘为助教。七七事变之后，徐仁南下，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生物系。1939年起，徐仁受聘云南大学生物学系，先后任讲师、副教授。据《国立云南大学民国二十八年至三十年薪俸表》，作为专任讲师，徐仁的数额(法币)情况如下：

^① Arunabha Ghosh, “Trans-Himalayan science in mid-twentieth century China and India: Birbal Sahni, Hsu Jen, and a Pan-Asian paleobotan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19, 2022, pp.239-261.

表 8-1

职别	姓名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三十年	
		原支 薪额	实发 薪俸	原支 薪额	实发 薪俸	原支 薪额	实发 薪俸
专任 讲师	徐仁			25000	19600	26000	26000

资料来源：刘兴育、王晓珠主编：《云南大学史料丛书·教职员卷（1922年~1949年）》，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85页。

1942年，徐仁被云大生物系聘任为副教授之后，据“民国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填报的《国立云南大学民国三十一年上半年度公务人员额俸薪半年报表》，其俸薪情况变动如下：

表 8-2

内部组织	职别	任别	姓名人数	俸薪	备注
生物系	副教授	聘任	徐仁 1 人	315	

资料来源：谭茂森主编：《云南大学行政后勤管理综述（1922—1966）》上册，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42页。

1942年4月20日，云南大学为庆祝二十周年校庆，“举行纪念会、运动会、游艺会、成绩展览及委座访印照片展览以资庆祝外，特请该校教授及国内有名学者，分别举行纪念演讲及撰述纪念论文”。其中徐仁提供了三篇论文，即徐仁、董愚得《竹苗之解剖》，徐仁《油杉苗尖之组织及生长》，徐仁《麻黄苗尖之组织》。^①

1943年5月28日，教育部给云南大学颁发训令，涉及徐仁。据《令知该校教员范锜等十二员资格审查结果由教育部训令》（学字第2561号 民国三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① 原载《云南日报》1942年4月20日第三版；此据刘兴育《旧闻新编——民国时期云南高校记忆》中册，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93页。另见《云大廿周年纪念 请学者演讲并撰论文》，《中央日报》（昆明）1942年4月20日第三版简讯。

合于讲师资格者：刘玉素、徐仁等二员；……又上开各员中郭文明一员原系教授，经审核改等为副教授；徐仁一员原系副教授，经审核改等为讲师。^①

徐仁为何从副教授改聘为讲师，其原因不明。此事并不说明他的学术水平达不到副教授的高度，而很可能是他与郭文明（医学专家、生物化学药理学代表）^②一样，因下一年度有外出计划（或其他的特殊情况）而影响到职称的下调。

1942年，为推动提升云南大学的生物学研究水平，远在英国的朱树屏拟邀请英国导师弗里奇（Fritsch）教授和剑桥大学生物学家普林山姆（Pringsheim）教授来昆明任教，他将这一消息函告云南大学理学院生物系主任崔芝兰（崔之兰）教授。10月24日，崔芝兰就此回信指出：

但是在云大，我很坦白地说，三年内还够不上需要这种第一流的科学家。现在生物系单独在昆明，植物方面目前只有一位副教授徐仁先生可以跟弗里奇和普林山姆作研究，助教还够不上，学生更不成，所以此事只好暂时搁置。张先生很望二位能去北大共同工作，他们植物方面人才较多，但是此时又与清华临时联合，学校极穷，设备简陋，根本无法筹款请弗里奇和普林山姆教授。^③

“张先生”即是崔芝兰的丈夫、著名的植物学家张景钺教授，他也是徐仁的老师。从此信中可见，崔芝兰是非常认可徐仁的学术水平的。在《国立云南大学教职员简历》中，徐仁的信息为：“清华大学理学

① 刘兴育、王晓珠主编：《云南大学史料丛书·教职员卷（1922年~1949年）》，第231页。

② 1952年，郭文明出任云南大学农学院园艺系主任。参见谭茂森主编《云南大学行政后勤管理综述（1922—1966）》上册，第278页。

③ 朱瑾、日月：《朱树屏传记：真实历史的回归》，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第48—49页。

士；曾任北京大学助教；中英庚款协助研究员。曾住于青莲街学士巷1号。”^①

（二）沙赫尼教授与中国学者的交往及徐仁申请赴印留学

沙赫尼教授是印度古植物学研究的世界级权威，1936年5月，他被遴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②，时任拉克瑙大学的植物学系主任兼理学院院长。他也“是李四光早年在英国相识的朋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③。作为一名接受西方教育、留英多年的古植物学家，与当时印度的知识精英一样，对英国的感情是较为复杂的，在他们心目中难免存在殖民优越感与反殖民的民族主义两种心态的冲突。

1937年12月19日，“中国地质会理事会在湖南长沙举行。到会理事杨钟健、冯景兰、李四光、张席禔5人。理事长杨钟健主持会议。决议：第十四届年会举行会期、地点；提出下届理事会候选人15人；通过A. C. Licharew（苏）、B. Sahni（印）、F. Heritsch（奥）3人通信会员”^④。在卢沟桥事变发生而华北陷入日军铁蹄蹂躏之际，平津等地的高校南迁，中国科学界和教育界可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中国科学家的活动及其与沙赫尼等世界优秀科学家之间的联络并未中断，期待继续保持交流与合作。沙赫尼被选为通信会员，说明他的学术成就也得到了中国地质学家们的高度认可。1942年汇编的《中国地质学会会员录》中，通信会员还有“Sahni, Birbal (Dr.), Lucknow, India”^⑤，且沙赫尼是来自印度的唯一会员。

据郭旭光所检录的档案，1938年4月12日，沙赫尼致函中国教育部，希望与中国科学家建立更多的联系。沙赫尼所熟悉的中国地质学与古植物学学者（以及在中国工作的学者）至少有：胡先骕（H.H.Hu）、张景钺（C. Y. Chang）、H. C. Hsieh、斯行健（H. C. Sze）、

① 刘兴育、王晓珠主编：《云南大学史料丛书·教职员卷（1922年~1949年）》，第268页。

② “Dr. Birbal Sahni Elected Fellow of the Royal Society”, *The Straits Times*, 23 May 1936, p. 19.

③ 李方正编著：《地质之光：李四光的故事》，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第94页。

④ 王弭力主编：《中国地质学会80周年记事》，北京：地质出版社，2002年，第14页。

⑤ 《中国地质学会会员录》，《中国地质学会志》1942年Z2期，第331—354页。此见该名录第19页。

李四光 (J. S. Lee)、葛利普 (A. W. Grabau)、翁文灏 (C. Y. Chang)、丁文江 (V. K. Ting)、谢家荣 (C. Y. Hsieh)、周宗浚 (T. C. Chow)、黄汲清 (T. K. Huang, 黄德淦) 等, 其中沙赫尼至少与张景钺、斯行健 (Hsing-Chien Sze, 1900—1964)、李四光等科学家以及国民政府外交部派驻加尔各答总领事沈士华 (Shen Shi-hua) 等人有多封信函来往。^①

沙赫尼与张景钺、斯行健、李四光的交往较多。斯行健192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 1928年赴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古植物学。“斯行健在名师的精心培育下迅速成长, 完成论著多篇, 并于1931年以优秀论文《中国里阿斯期植物群》通过答辩, 成为我国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古植物学家。随后赴伦敦出席国际植物学会, 并与印度古植物学创始人B. 萨尼(Sahni)教授结为密友。两位富有民族自尊心的亚洲学者从此常以彼此相同的经历和感受互相勉励、互相促进, 为各自祖国的古植物学事业做出重大贡献。”^②斯行健的博士论文是用德文写的 *Beitrag zur Liassischen Flora von China* (《中国里阿斯期植物群》), 1931年列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西文集刊第十二号出版。^③透过与斯行健等人的交往, 沙赫尼了解到中国的古植物学研究情况, 更为重要的是, 他找到了志同道合的研究伙伴, 可以为民族的自强自立而在科学研究方面做出贡献, 以弘扬民族的自信心, 同时有助于消除殖民文化的印记。

1942年2月, 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访印, 虽然未能达到调解英印紧张对峙以共同应对远东抗日战争的外交目的, 但至少与英印达成了加强中印文化和学术交流的共识。同年5月, 被中国媒体称作“印度政府教育司长”的沙金特 (Dr. John Sargent) 应国民政府中宣部和教

① Arunabha Ghosh, “Trans-Himalayan science in mid-twentieth century China and India: Birbal Sahni, Hsu Jen, and a Pan-Asian paleobotany”, pp.244–248.

②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编·地学卷1》,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338页。

③ 冯卓:《追寻斯行健(H.C.Sze)院士博士论文始末》,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405340-469551.html>

育部之邀，从加尔各答抵达重庆，开启了一段访华之旅。沙金特实任“印度教育顾问”（Educational Adviser），他是英国的一名技术专家，长期在英印政府教育部门任职。中国在抗战期间排除万难而不断进步的高等教育给沙金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积极推动中印双方的留学生来往与学者互访。

有关徐仁的出国留学有多种说法。比如，孙启高所引用的一个说法为：“张景钺教授曾推荐徐仁到英国 University of Glasgow 跟随 John Walton（1895—1971）学习古植物学。……由于战争和路费等问题，徐仁原来准备赴英国 University of Glasgow 留学的计划没有成行。”徐竺声也提到其父“大约在1939年，他曾联系好到英国和瑞典深造，后来因欧战爆发而未能成行”。还有的学者说，徐仁为了去英国，而在香港等待了一段时间，但最后没能去成。不管怎么说，沙金特的中国之行推动了中印政府层面互派研究生。这些事情也为徐仁赴印留学提供了一个良好而难得的历史契机。

沙赫尼对促进中印双方的科学研究是很感兴趣的。这也是他愿意接纳徐仁前来求学和共同研究的心理基础。大约在1943年春，沙赫尼曾与当时在印度孟买留学的周达夫先生有来往，他在信函中说：

中国是素来吸引我的，我喜欢去昆明的。Jen Hsu 教授正想要到我们这里来工作两年，以古植物学考拉克瑙大学的博士。我不敢说他的计划可否实现，我们是在尽量设法帮助他来。我要给他研究的，除了别的以外，还有一些中国的植物化石，几年前我曾研究的，我们准备共同工作。我曾遇见过几个中国的地质学者古生物学者，我高兴到中国去再见到他们。沙赫尼。^①

此信见于周达夫的《印度古植物学权威沙赫尼教授》（写于“三十二年

^① 周达夫：《印度古植物学权威沙赫尼教授》，《读书通讯》（半月刊）第74期“学人小传”，1943年，第10—11页。

六月十七日孟买”）一文中。周达夫在此文中简要介绍了沙赫尼的学术经历与成就，特别是他对中国学者的兴趣与合作态度。

沙赫尼愿意积极帮助徐仁到印度留学，也与当时的一批印度科学家希望同中国的顶级（或学术发展势头很好的）科学家们合作的氛围是分不开的。1943年，周达夫在加尔各答还翻译了印度数学家高善必（D.Ko Sambhi）草拟的《中印学术合作方案拟议》。周达夫认为该方案非常实在，其中列出了当时印度第一流的学者名单可供赴印的中国学生选择，以就教于名师。其中，“二.植物学：偏重‘古植物学’，有拉克瑙大学之沙赫尼教授（Prof. B. Sahni）”。高善必的这一方案同时也希望中国派遣陈省身、许宝禄等第一流的科学家来印进行考察和交流^①。1943年11月12日，竺可桢在日记中提及类似的情况：“教部嘱学校派讲师赴印度教数理，余颇属意熊全治，但熊欲去美国，不愿赴印，余嘱步青劝之。”^②12月17日，竺可桢在日记中进一步记载了中印交流的相关信息：

出至教育部，遇士选与百川，与谈派六交换教授至印度事。缘印度有达达钢铁公司，其主人系祆教中人Parsi，欲以三万卢比请中国大学教授去印度参加研究。教部曾指定五六大学，嘱派人，但说明系讲师，与印度来文意见已不一致。今日询士选，则谓印度政府是否欢迎尚成问题，可知教部未将此事弄清楚。适李方桂将去印度出席All India科学会及东方语言学会，驻印周达夫来函，嘱中央研究院派人。适树人在院中，谓Puna数学教授Okari来函，谓前次一樵、士选去印考察，殊乏意义。以两方工作不能联合。Raman教授希望吴大猷能往印度，故印度所希望者，乃中国科学

① [印度]高善必：《中印学术合作方案拟议》，周达夫译，《读书通讯》（半月刊）第68期“学术论著”，1943年，第2—4页。

②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八卷《日记（1941—1943）》，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70页。

界第一等人材，非普通讲师也。^①

达达钢铁公司是印度首屈一指的大公司之一。该公司先后邀请了不少中国科学家前往研究，柯俊受国民政府委派去印度，其工作与该公司直接相关。Okari教授给薄树人的来函，也涉及中印科学家的往来设想。高善必等印方学者及英印政府要求“中国科学界第一等人材”前往，很显然存在从中交流受益的想法。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高善必等人还积极赴北京参与双方的交流活动。1957年4月13日，夏鼐“下午赴所，苏秉琦同志谈北大学生考古实习事。裴文中同志来，偕往北京饭店访印度高善必（Kosambi）教授。他提出三点建议：（1）出外文年报，（2）组织考察队调查中英贸易路线，（3）在印度召集亚洲考古国际会议。至8时始告辞”^②。他提出的三条建议就是基于双方合作而开展的。5月7日，“下午印度数学家高善必（D.D.Kosambi）来我所参观，并闲谈考古学问题”^③。高善必是印度著名的数学家、历史学家，对考古自然也很有兴趣。

目前笔者暂未找到徐仁与沙赫尼的最早通信，徐仁的回忆中说是“1943年任印度Lucknow（卢克脑）大学地质植物系研究员，收到B.Sahni欢迎信”^④。很可能是沙赫尼知道徐仁对古植物学有兴趣，就向他发出了邀请。两个人的中介可能是张景钺或李四光，也可能是其他人（如斯行健），有待进一步的追溯。但比较清楚的是，徐仁赴印留学一事应该发端于1942年底。

1943年一月十二日，徐仁函请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以学校名义代为办理出国护照。徐仁此函的内容如下：

①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八卷《日记（1941—1943）》，第690页。

② 夏鼐：《夏鼐日记》第五卷（1953—1958），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01页。

③ 同上书，第305页。

④ 徐仁：《徐仁回忆录》，《徐仁论著选集》，第315页。

晚拟于本年五月赴印度卢克老大学（Lucknow University）与 Sahni 教授合作，研究东亚中生代植物（印度中国两区比较），请用 [我] 校名义派往，以便办理护照。居留期间为二年，特请俯予备函申请外交部发给护照。

此致

熊校长

晚徐仁 呈
一月十二日^①

1943年二月十九日，熊庆来同意“本校派赴”的名义，并致函外交部请准予发给徐仁出国护照。这是云南大学的一份公函，具体内容如下：

[字第00222号]

敬启者。兹为本校副教授徐仁先生由本校派赴印度卢克老大学（Lucknow University）与 Sahni 教授合作研究东亚中生代植物（印度中国两区比较），拟于本年五月起程，居留期间定为二年。用特函达，请烦查照，准予惠发护照，以利前往。无任感荷。

此致

外交部

附护照二张、相片五张、汇票一纸。

校长 熊庆来
三十二年二月十九日^②

徐仁办理出国手续时间很长，根据他的回忆录中所说：“因拒不

① 刘兴育主编：《云南大学史料丛书·学术卷（1923年~1949年）》，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22页。

② 同上。

加入国民党，为换护照遇到麻烦，耽搁半年。后来用学生护照去的印度。”^①可见，徐仁没有获得正式的公派资格，而是以自费的留学生身份赴印。

1943年四月初八日，云南大学为徐仁赴印度研究而致函教育部长陈立夫，具体内容如下：

为本校副教授徐仁先生，因赴印度研究东亚中生代植物，请转咨外交部签复护照，以利前往。

案据本校生物系副教授徐仁先生，呈为与印度卢克老大学（University of Lucknow）桑尼教授（Prof. B. Sahni）合作研究东亚中生代植物，须赴印度一行，研究期限定为二年。恳请转呈钧部，核转外交部准予签发期限二年之出国护照以利前往。等情前来经查属实，理合备文，转请钧部，签核准予转咨外交部迅赐签发，俾该员得早日出国从事研究，实为公便。

谨呈教育部长陈^②

徐仁出国须办的手续较多，除云南大学同意之外，还需征得教育部的批准，并且需要外交部签发护照。教育部对徐仁赴印显然没有同意“公派”，而是“核准自费”，但期限由二年延长为三年。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清华大学的陈省身、孟昭英申请出国，梅贻琦校长就要求外交部发给“官员护照”。1943年3月24日，梅贻琦为此呈教育部函的内容如下：

为本校教授陈省身、孟昭英拟于夏间休假出国研究。为旅途便利起见，请转外交部发给官员护照。二君在校任教已六、七年成绩，陈君近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赠与研究学额（每年美

① 徐仁：《徐仁回忆录》，《徐仁论著选集》，第315页。

② 刘兴育、王晓珠主编：《云南大学史料丛书·教职员卷（1922年~1949年）》，第359页。

金一千五百元),足可维持在美用费。孟君系返其原校加省工科大学更进研究。……^①

可见在当时因出国者身份、出国地点等因素的不同,也就存在护照类别的巨大差异。

5月3日,教育部颁发训令给予清华大学,告知外交部的回复是“查各机关派赴国外工作人员请照出国,奉谕须附送党政班毕业证书,并在领照清单上注明毕业期别及证书字号,以凭核夺”,要求两人提供具体的证明。^②这也可以从侧面印证徐仁为何只能领取学生护照的原因所在。

当时的出国留学最重要的事情还有申请出国所用的外汇。因为是战时,外汇管理特别严格,所以,徐仁需要云南大学出面代向平准外汇基金委员会申请兑换外汇。据胡宗刚《云南植物研究史略》中的记载:

(1943年)7月27日,云大致函平准外汇基金委员会昆明办事处,为徐仁赴印度申请兑换外汇,其中云:“本校生物系副教授徐仁先生,呈经教育部核准自费赴印度之卢克老大学研究植物学,年限定为三年。”

12月14日,云大再次为外汇事向外汇管理局交涉,其中云:“教育部核发自费留学证书,并领获外交部交字第20720号出国护照,经英国驻昆明总领事于本年11月13日签字。”^③

此书中提及的这两条资料并非第一手的证据,还需要与别的第一手档案资料进行印证。经与下文所引熊庆来函(“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

① “我是‘与校同寿’——陈省身纪念展撷英(下)”,<https://xsg.tsinghua.edu.cn/info/1002/2799.htm>。2023年8月5日查阅。

② 《教育部训令,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三卷(上)“抗日战争时期的清华大学(1937—1946)”,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07—308页。

③ 胡宗刚:《云南植物研究史略》,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24—125页。

日”)对证可知,徐仁被批准“第一年生活用2400元”。

在徐仁申请赴印留学的过程中,1944年三月二十一日,熊庆来还另向教育部推荐云南大学的沈福彭教授前往印度从事研究工作。熊庆来的公函内容如下:

案查前奉钧部卅二年十月廿八日高字第五三〇三九号训令以准外交部函,印度达达公司拟资助我国讲座前往研究,飭遴荐医学院教授一人至二人,并检附各员著作呈部以凭核选等因,奉此。查本校医学院教授沈福彭于教学研究均有成绩,为我国不可多得之学者,兹拟遴荐该员前往研究,时期以一年为限。已征得该员同意,理合检具该员履历史及著作目录各一份、相片二张备文呈送,请祈钧部鉴核示遵。实为公便。

谨呈

教育部部长陈

附呈沈福彭教授履历一份、著作目录一份、相片二张。

国立云南大学校长 熊庆来

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①

徐仁到达印度的具体时间应该是在1944年3月下旬或更早一点。据1944年3月27日来自印度加尔各答的消息,“西南联大植物学教授徐仁来印,与古物权威沙赫尼教授共同研究。北大理学院院长饶毓泰由昆飞加,转道赴美,拟往邦加洛访问印度著名物理学家拉玛”^②。拉玛即C. V. Raman。饶毓泰是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他赴美之旅,需从昆明转道加尔各答。这是战时(及战后)的中欧(及中美)之旅的常见

① “熊庆来向教育部推荐沈福彭前往印度从事研究工作(1944年3月21日)”,收入刘兴育主编《云南大学史料丛书·学术卷(1923年~1949年)》,第223页。另见张昌山主编《云大老档案》,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8页。笔者据此页公布的档案照片,对公函文字略有校正。

② 《加城小简》,《大公报》(重庆版)1944年4月3日第二版。另见《大公报》(桂林版)1944年4月13日第四版。

选择，也为中国科学家短暂停留印度及其与印度学者见面交流提供了难得的契机。1946年底，竺可桢一行赴巴黎参加第一届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会议，11月4日至10日在加尔各答逗留数天。11月8日上午，他们曾参观加尔各答大学理学院，“余等至理学院晤Prof. Saha（Heat authority）及新来之Bose教授，均未到校。出后至隔壁Bose Institute，乃有名植物生理学家Sir J. C. Bose所设立。……其侄继续其工作，引往参观”^①。因此，中国科学家在印度的这类“过境交流”式的参观与聚谈活动较多，比如，1943年7月15日，陈省身从昆明飞抵加尔各答，逗留两个星期，在加尔各答大学和加城数学会共作五次学术讲座。1945年10月29日至11月1日，沙赫尼也接待了过境来访的张景钺，双方相见甚欢。类似这样的交流方式及其效果仍有待详细梳理和考察，其意义不容视而不见。

（三）徐仁在印度出席科学会

1945年12月8日，熊庆来为徐仁在印度出席科学会再次申请外汇，致函重庆的中央银行业务局。该函内容如下：

敬启者。案据敝校理学院生物学系副教授徐仁自印度来函，以参加印度两科学年会，一为印度国家科学院会议，于本年十二月廿四日至卅一日在乌达潘举行；一为印度国家科学会议，于明年一月一日至七日在朋加拿举行。因两地相距太远，需用各种费用及入会费印币五百盾，请转函请予照购，以资应用，等情前来。查徐仁副教授系奉教育部核准，于三十三年一月自费赴印度卢克老大学研究植物学，曾领有教育部第三十号自费留学证书及外交部交字第二〇七二〇号留学护照，并蒙中央信托局渝核字第六一五号函核准第一生活用费式千四百元。兹据函因出席印度国家科学会议，需印币五百盾，事关联络中印学术，应请贵局准

^①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十卷《日记（1946—1947）》，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46页。

予照购外汇。相应函达，即希查照办理见覆为荷。

此致

重庆中央银行业务局

校长 熊〇〇

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八日^①

12月20日，熊庆来为“徐仁赴印度出席科学会需要用印币事由致重庆央行函”。该函内容如下：

三十三年一月，生物系副教授徐仁奉准自费赴印度卢克老大学研究植物学（教育部自费留学证书），并得三十三年一月十四日外汇管理会核准：第一年生活用2400元。刻据徐仁教授自印度来函，呈请转函贵（外汇）局为“因拟出席印度科学年会，需用印币500盾至肯再代请，印方有两学会：一为印度国家科学会议将于一月一日至七日在朋加拿地方举行，一为印度国家科学院会议将于十二月廿四日至卅一日在乌达潘地方举行。两地相距甚远，入会费亦多，为将来中印学术上联络起见，拟为永久会员”，请恳准予代请等情，查所呈属实，并于学术研究上必多助益，拟请贵局惠予允准照购，相应函达，至希查明办理为荷。

此致

重庆中央银行业务局

校长 熊庆来

附：

熊庆来致函银行业务局，1946年1月2日徐仁在印度卢克老大学之桑尼教授（印度古生植物学权威），遂将学习后移至本年六月，以便完成研究论文，呈请转函贵局准予续购第三年度六个月

^① “致重庆中央银行业务局函（1945年12月8日）”，收入刘兴育主编《云南大学史料丛书·校长信函卷（1922年~1949年）》，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90—191页。

之生活费及学费卢比1500盾，使徐仁两年研究工作之论文得完善结束等情。徐仁返国后，对国内古生植物学工作及国际间之名誉殊重要，且对在郑有芳（友邦）名教授之热忱叮嘱须迟数月回国，所请购外汇，亦在情理之中，拟请贵局允准照购。

民国卅四年十二月廿日^①

该函的另一版本为：

敬启者。查本校理学院生物系副教授徐仁，奉准予卅三年一月自费赴印度卢克老大学研究植物学（教育部自费留学证书第卅号、外交部留学护照交字第20720号、昆明英国总领事于卅二年十一月十三日签字880号），并得卅三年一月十四日外汇管理委员会渝管一字2938号（中央信托局渝核字第六一五号）核准：第一年生活用费式千肆百盾。刻据徐仁教授自印度来函，呈请转函贵局，为“因拟出席印度科学年会，需用印币五百盾至肯再代请。印方有两学会：一为印度国家科学会议，将于一月一日至七日在朋加拿地方举行；一为印度国家科学院会议，将于十二月廿四日至卅一日在乌达潘地方举行。两地相距太远，入会费亦多。为将来中印学术上联络起见，拟为永久会员，请恳准予代请”等情。查所呈属实，并于学术研究上必多助益，拟请贵局惠予允准照购，相应函达，至希查照办理为荷。

此致

重庆中央银行业务局

校长 ○○○

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②

-
- ① “徐仁赴印度出席科学会需要用印币事由致重庆央行函”，收入刘兴育、王晓珠主编《云南大学史料丛书·教职员卷（1922年~1949年）》，第361页。“在郑有芳”四字显误，应是“友邦”之笔误。
- ② “致重庆中央银行业务局函”，收入刘兴育主编《云南大学史料丛书·校长信函卷（1922年~1949年）》，第191页。

1946年1月31日，徐仁的好友周家炽致函熊庆来校长，汇报徐仁因延期返国而请购外汇之事。该函的内容如下：

校长先生：

刻得徐仁先生自印来函，谓印度之桑尼教授嘱稍迟数月回国，以便完成论文。故呈请先生准予转函中央银行请购卢比壹仟五百盾作生活费及学费。不胜感激。敬请

教安

晚周家炽谨上

民国三十五年一月三十一日^①

1946年2月4日，熊庆来为此再度函请重庆中央银行业务局准予徐仁续购外汇。该函内容如下：

敬启者。查本校理学院生物学系副教授徐仁，奉准予卅三年一月自费赴印度卢克老大学研究植物学（教育部自费留学证书第卅号、外交部留学护照交字第20720号、昆明英国总领事于卅二年十一月十三日签字880号），并得卅三年一月十四日外汇管理委员会渝管一字2938（中央信托局渝核字第615号）核准“由中央银行核汇贰仟肆佰盾”，又得卅四年中行业政字135号核准壹仟伍佰盾。刻据徐仁〔副〕教授卅五年一月廿二日自印度来函称，印度卢克老大学之桑尼教授（印度古生植物学权威）嘱将返国之期后移至本年六月，以便完成研究论文，呈请转函贵局准予续购第三年度六个月之生活费及学费卢比壹仟五百盾，俾两年研究工作

^① “周家炽致熊庆来函”，收入刘兴育主编《云南大学史料丛书·校长信函卷（1922年~1949年）》，第193页。

之论文得完善结束等情。查该〔副〕教授因完成论文，须稍迟数月回国，所请续购外汇一节，拟请贵局惠予允准。相应函达，至希办理见复为荷。

此致

重庆中央银行业务局

国立云南大学校长

民国三十五年二月四日^①

2月5日，熊庆来的公函文字与此略有不同，具体如下：

径启者。查本校理学院生物学系副教授徐仁，奉准于卅三年一月自费赴印度卢克老大学研究植物学（教育部自费留学证书〔第卅号〕、外交部留学护照〔交字第20720号〕、昆明英国总领事于卅二年十一月十三日签〔字880号〕），并得卅三年一月十四日外汇管理委员会〔渝管字2938号〕（中央信托局〔渝核字第615号〕）公函核准“由中央银行核汇贰仟肆佰盾”，又得卅四年中行〔业政字135号〕公函核准壹仟伍佰盾。刻据徐仁教授卅五年一月廿二日自印度来函称，印度卢克老大学之桑尼教授（印度古生植物学权威）嘱将返国之期后移至本年六月，以便完成研究论文，呈请转函贵局准予续购第三年度六个月之生活费及学费卢比壹仟五百盾，俾两年研究工作之论文得完善结束等情。查该教授因完成论文（于其本人返国后对国内古生植物学工作及国际之名誉殊属重要，且对友邦名教授之热诚叮嘱），须稍迟数月回国，所请续购外汇一节（亦在情理之中），拟请贵局

^① “致重庆中央银行业务局函”，收入刘兴育主编《云南大学史料丛书·校长信函卷（1922年~1949年）》，第193页。

惠予允准。相应函达，至希办理见复为荷。

此致

重庆中央银行业务局

国立云南大学校长

民国三十五年二月五日^①

由上述的这些公函可知，徐仁在印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自理的，需要从设在重庆的中央银行业务局获批购买外汇额度。在战争年代，徐仁的异国生活颇不容易。云南大学校方对徐仁的留学深造还是极为支持的，熊庆来校长多次具函相关部门，以解徐仁的生活与学术研究之忧。从印方发现的史料来看，徐仁在勒克瑙大学也得到了校方的部分资助，以帮助他延长学习期限，顺利完成学业。

二、徐仁回国与第二次再去印度

（一）徐仁的回国及其在北大任教

徐仁在勒克瑙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还荣获了该校的金质奖章。可以说是顺利地完成了留学与研究计划。徐仁出国时，就计划离开云南大学，而回归北京大学任教。在抗战胜利后，北大从昆明复员回到北平的前夕，据《国立北京大学现有教职员（包括休假或请假在国内外今夏返校者）及眷属人数清册》（1946年）中，徐仁的相关信息如下：

^① “熊庆来致重庆中央银行业务局准予徐仁续购外汇（1946年2月5日）”，收入刘兴育主编《云南大学史料丛书·学术卷（1923年~1949年）》，第227页。

表 8-3

系别	职称	姓名	年龄	眷属			私物 公斤数	附注	籍贯
				大	中	小			
生物系 地质系	副教授	徐仁	35岁	1	2	1	300	现在印度	安徽当涂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4·教职员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42页。

1946年夏，徐仁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地质系的副教授。1946年7月18日，联大滞渝的三十四名教授（汤用彤、冯至、冯友兰、徐仁、姚从吾、周炳琳、叶企孙等人）致函教育部长朱家骅，为闻一多教授不幸死难之事提出控诉，要求当局缉拿凶手。^①徐仁参与此次签名，表现出了很强的正义感。

1946年8月，“去国两年半”的徐仁归国不久接受《益世报》的记者采访，简要介绍了印度的政治、经济、农业、工业和科研的一些情况。他特别提及：

全印不过有二十个大学，学校里的教授是登报应聘的，几乎每个人在学术上都有相当高深的造诣。例如班加洛尔的拉门（C. V. Raman）先生，是得过诺贝尔奖金的反射学权威。与亚拉哈巴（Alahabad）大学研究反射学的克瑞士南（K. S. Krishnan）先生，同是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卢克脑大学的萨尼（B. Sahni）先生，是世界古植物学学会的副会长。除去大学，班加洛尔地方还有一个塔塔研究所，更是一个世界知名的学术研究机关，研究宇宙线的巴巴（H. J. Bhabha）先生，便在这机关工作。^②

① 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闻一多研究会编：《闻一多研究动态》（第1—50期·合订本），第22页。

② 《天竺二三事——徐仁教授谈印度》，《益世报》1946年8月22日第四版。

此处所列举的几位学者都是印度具有世界级影响的顶尖学者。

徐仁除在北京大学主要讲授植物形态学、解剖学和古植物学等课程之外，1946年秋还被清华大学聘为兼职教师，代替其师张景钺的兼职课程，讲授植物形态学^①，聘任期也由半年延长为一年^②。

留德十年之后，1946年季羨林归国，被北京大学聘为文学院新组建的东方语文学系副教授。9月21日，季羨林抵达北平，当天就被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告知直接被聘为教授，不久还兼任了系主任。在沙滩校园中，季羨林与徐仁有多次见面，季羨林的归国日记中略有记载。1946年10月10日：

今天是双十节，早晨七点前起来，洗过脸，又是吃花生米当早点，吃完写给俞晶一封信。九点前到松公府前面去等汽车，遇到清华同学徐仁，一同[坐]汽车到国会街去参加北大开学典礼。十点开始，胡校长发表演说，很精彩。十一点半散会，同姚从吾出来，找了个小馆随便吃了点饭，就到西单商场去逛旧书摊。^③

从印度回国的徐仁也赶上了参加北大的开学典礼。1947年1月12日下午，季羨林“四点半出去，到中老胡同教员宿舍送了两本杂志，到东斋去看马坚和徐仁，都不在。到外面食堂吃过晚饭，回来看报，抄论文”。可见，徐仁是住在东斋。1月16日下午，“五点回来，到庄孝德屋里去谈了谈，同他和她（他）侄女一同出去吃过晚饭，又到我屋里来闲谈。徐仁来，谈到九点多走”。季羨林是研究印度学的，而徐仁有两年多留印的亲身经历，两人虽从事的学科研究差别很大，但不乏有

① 《致函叶企孙：因张景钺不能来清华兼课，改为徐仁兼课，请将徐仁担任课程重点薪金更改后赐下》，清华大学档案馆藏，档案编号1-4：2-103：3-006。

② 《致函叶企孙：请将徐仁聘书改为全年聘约》，清华大学档案馆藏，档案编号1-4：2-103：3-109。以上两份档案信息，参见徐丁丁《国立清华大学生物学系发展史》，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年，第70页。

③ 季羨林：《此心安处是吾乡：季羨林归国日记（1946—1947）》，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年，第93页。

较多的共同语言。6月12日上午，“十一点半出去到对面小馆吃过午饭，回来躺下休息了会，没能睡着。徐仁来，坐了会就走了”^①。两人的交往次数不算频密，但应该还是关系不错的朋友。

1947年9月13日，《华北日报》公布《北大本年教授阵容》，其中理学院地质系有12位教授，包括“徐仁（古植物学、普通植物学）”^②。9月20日，因生活困难，袁翰青、徐仁、殷宏章、张景钺等33位北大教师，再度致函校长胡适，要求提升待遇，以解决生活难题^③。11月18日，徐仁参加了在清华生物学馆举办的清华燕京生物学讨论会，发言题目是《古植物学研究之方法及其应用》。他用英文书写的这个发言提纲（至少一页）现存中科院植物所的档案室，编号为A002-1947-1。

1948年，国立北京大学讲师讲员助教联合会编写了一本《北大院系介绍》，相当于一本招生手册，其中对徐仁的介绍是：

徐仁：专任副教授（与地质系合聘），普通植物学、古植物学。拉克脑大学哲学博士。曾任本校助教五年，中英庚款协助研究员一年。云南大学副教授四年，拉克脑大学研究院研究员二年。本校副教授，印度古植物学研究所博物馆主任。^④

1948年6月29日，为抗议国民党军机轰炸开封，尤其是河南大学校园，“北平各院校教授一百零四人，昨发表宣言，呼吁停止破坏文化机关及轰炸古城。”该名单中有王岷原、Robert Winter（温德）、朱光潜、沈从文、周一良、马坚、徐仁、陈寅恪、冯至等。^⑤这再一次表明了徐

① 季羨林：《此心安处是吾乡：季羨林归国日记（1946—1947）》，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年，第145、147、222页。

② 《北大本年教授阵容》，《华北日报》1947年9月13日第五版。

③ 《北大教授为待遇再函胡适》，《华北日报》1947年9月21日第五版。

④ 国立北京大学讲师讲员助教联合会：《北大院系介绍》，北京大学讲师讲员助教联合会印行，1948年，第19页。

⑤ 《抗议轰炸开封》，北平《新民报》1948年6月29日。

仁的政治参与是基于正义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挚爱。

（二）徐仁第二次申请去印度从事科研

1968年6月3日，徐仁在特殊的年代亲笔书写了一份自我批判的材料。孙启高公布了该份材料中的一页，其内容对我们了解徐仁的生平（尤其是出国前后的经历及想法）有一定的价值，故录文如下：

VI/3 个人奋斗，资产阶级的世界观

我在父亲去世后，家中只有房子，觉得自己只有用功读书，找一个有保障的职业，生活下来。我考入了所谓的最好的学校，想学医，因为医生是万事不求人的。学医不成，就学植物。后来觉得植物形态应用不广，就学古植物学。在古植物学中，又学习了孢粉学。这样挤入到“专家”之列中。

在那个时代，不出国留学是没有出路的，不能在“最好的学校”教书。后来到印度学了一些东西，因为未到欧美去过，人家也看不起。又抓着机会第二次出国，中间到欧洲去了一下，又学习到不少东西，这样声望又高了一些。

解放后回来就想大显身手，办火山岩训练班，宣传孢粉分析的作用。在对比地层上，采用火山化石合用，来解决问题。在许多讨论会上，总是以专家自居，充分暴露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在平时，不知不觉地散布一些“个人奋斗”的毒素，腐蚀青年。这是有罪的。自己时常说，我也没有学过地质学，也能做工作，也能看到什么运动。^①

徐仁在此简要说明了自己学习古植物学以及出国留学的缘起，其中“人家也看不起”可能是他当时教学工作中遇到的一种真切感受。

因为在印两年的研究成果突出，徐仁不仅获得了金质奖章和博士

^① 孙启高：《中国古植物学家徐仁院士在“文革”期间的忏悔（节录）》，<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25931-729675.html>，2023年5月20日查阅。

学位，还再度受到沙赫尼教授的邀请，拟第二次赴印合作研究。北京大学档案馆中收藏了一份档案，编号BD1948152，拟名为《徐仁赴印度申请外汇致函胡校长请求帮助》，乃是一封1948年7月5日徐仁写给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的信函。该函的内容如下：

适之校长钧鉴：^晚前应印度古植物学研究所函聘前往研究，已得教部批准予携眷出国，并由外交部发给护照。比因出国购买船票必需外汇，当向印方申请路费，但印度准予到所后补给本人路费，乃呈请教部准予结购本人及眷属出国旅费。嗣得教部文字第34703号六月廿三日批示，未能准请。^晚以外汇既经政府统制，应聘出国研究人员例准结购旅费，且^晚系请结购排价外汇，并非申请官价，是教部或有未尽谅解之处，兹除直接再行申请教部批准外，敬恳钧座俯为援助，可否代^晚函朱骝先先生解释，请其飭主管部分早日批准，俾能结购赴印旅费，以便成行而求深造。肃此敬请
钧安！

晚 徐仁 敬上
七月五日

此函共二纸，书于“国立北京大学理学院用笺”。徐仁接受印方邀请，自然需向北京大学和教育部进行申请，以便获得外交部颁发的护照。自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内局势日益混乱，国共内战烽火四起，外汇管制趋向严格。早在1947年9月，就发生过因为无法申请外汇，出国访学的交换教授难以成行的事情。^①徐悲鸿就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之后，在1947年五月二十日写给张安治的信函中，曾提及“外汇尚未由政院批下，焦急殊深”。所谓“政院”，就是指国民政府的行政院，乃是外汇管理机构的主管单位。

^① 《申请外汇受限制，交换教授难实现》，《前线日报》1947年9月22日第二版。参见吴晓铃《遥瞻印度》（之二）：“外汇问题”。

目前尚未找到胡适对徐仁此函的回应资料，但徐仁最后能够成功赴印，说明胡适应该从中起过支持作用。1948年7月11日，《大公报》（香港版）刊布的北京大学教职员名单中，有“生物学系主任殷宏章，教授沈家瑞、吴素萱、汪敬熙、徐仁、罗士苇。地质学系主任孙云铸，教授黄烈、王竹泉、黄汲清、杨钟健、斐文中。”^①此时徐仁已经规划好要携带家眷第二次赴印了。此外，7月30日，胡适从北平致时任民国政府驻印度大使罗家伦（字志希）的一函（名片）亦可证明这一点。该函内容如下：

志希兄：

印度德黎大学古植物学研究所请北大教授徐仁先生去主持，这是中印文化关系史上一件大事。徐君即将来印，一切盼兄与贵馆予以支持协助，至感。

弟 适 卅七、七、卅^②

胡适此函中有一小错误，邀请徐仁的并不是印度德黎大学（Delhi University），而是徐仁以前就读的勒克瑙大学。罗家伦在印度工作时，还顺道特意去看望过徐仁。1949年3月3日，罗家伦“访徐仁于乐克劳大学之古植物学院，彼夫妻均在”^③。

罗家伦的日记中还提及了另一位北大植物学教授殷宏章，亦被派遣至印度工作。^④1944年10月11日，西南联合大学第三二次行政会议上，“梅主席报告：教育部为据本大学教授殷宏章（Yin, H.C.）呈请于留英讲学期间照领原支薪津等情仰遵照训令”^⑤。从英国归国之后不

① 《北京大学》，《大公报》（香港版）1948年7月11日第六版“体育与教育”。

② 罗久芳、罗久蓉编辑校注：《罗家伦先生文存补遗》，“中研院”近代史所，2009年，第273页。

③ 罗家伦：《日记——出使印度》，《罗家伦先生文存》第八册，台北：“国史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9年，第292页。

④ 同上书，第289页。

⑤ 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2·会议记录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51页。

久，“殷宏章一家生活甚是艰难，为了摆脱困境，只得另谋生路”。崔之兰1945年6月2日给朱树屏的信中就特别提到：“学长在英多年未曾亲尝此次的苦况，目前中国人除了极少数发国财的人外，皆极端窘困。公教人员对衣服鞋袜已经早无力购买，每月所入不够吃饭，到了月底如还有买菜的钱就认为是阔气了。殷先生有五个孩子，所以他受的窘困更深。所幸教育界多数的人还能保持清白，不因贪图温饱而降低操守，可是他们把战前所积的金钱、什物及健康都全部贡献国家了！”^①殷宏章“应英国李约瑟博士的邀请，于1948年12月10日去巴黎转赴印度，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南亚科学合作馆科学官员，协助该地区国家开展科研工作及合作交流事务，历时3年”^②。

三、徐仁在印度的研究及其贡献

（一）徐仁第一次在印度的研究工作

徐仁第一次在印度停留大约两年半，在勒克瑙大学植物系攻读的科目，与他最初所学的并不相同。徐仁在古植物学和古孢粉学方面的知识及成绩，主要得益于他的导师沙赫尼教授这位有国际影响力的古植物学家。徐仁的研究聚焦于中国云南泥盆纪植物，这与徐仁在昆明工作过数年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徐仁还对微体古植物学范畴的泥盆纪孢子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的研究反过来也助力了沙赫尼教授的科研。此外，徐仁还到过克什米尔等不少偏僻的地方，进行田野调研。比如，他在旁遮普地区考察，“见到舌羊齿植物”。徐仁还花了九个月时间抄写了沙赫尼教授积累的一套古植物学文献目录。这体现了徐仁的耐心、细致，也为他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③

① 日月、朱谨编：《朱树屏信札》，北京：海洋出版社，2007年，第128—129页。

② 宋立志编著：《名校精英：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北京：京华出版社，2010年，第158页。

③ 孙启高：《历史因细节而生动——一套没有出版的古植物学文献目录》，<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25931-439093.html>

对中国学者的贡献，沙赫尼教授也曾大为称赞。斯行健曾提到中国学者的论文，“那些文章发表之后，各国教授都有好评；若干书报，也有评介。尤其是徐先生的老师 Sahni 教授也于 1945 年五月间致信李四光先生对此文大加赞许。那时徐先生还在印度，不会不知道的”^①。沙赫尼给李四光的这封信，促使李四光完成了名篇《受了歪曲的亚洲大陆》（详下）。

徐仁 1946 年在印度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很长时间不见踪迹。孙启高先生经过十几年（1997—2011）的不懈努力，2011 年 9 月 2 日终于在“北京一位学术前辈的个人珍藏文献中看到徐仁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文字部分）”，他将该论文有关的 9 张照片于 2013 年 10 月 11 日公布在科学网（www.sciencenet.cn）的“livingfossil 的个人博客”上。该博文题目为《中国古植物学家徐仁院士的博士学位论文之发现》。^②根据博文中的照片可知，徐仁的博士论文的封面上粘贴了一张纸条，其内容为：

Contribution to Palaeobotany
Volume I (Text)
Thesis submitted for the degree of Ph.D. of
Lucknow University
Jen Hsü

封二的内容基本与封面相同，仅多出了日期：April 1946。据论文的目录，本论文（文字部分）由绪论和五章（五篇论文）组成。这五篇论文的题目分别如下：

(1) Search for Microfossils in the Purple Sandstone, Khewra

① 斯行健：《谈植物化石》，《科学》第 30 卷第 11 期，1948 年，第 340 页。

②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25931-731887.html>，2023 年 5 月 6 日查阅。

Goege

(2) Plant Fragments from Devonian Beds in Central Yunan, China

(3) Plant Microfossils from Some Devonian Rocks at P'oshi, in the District of Lihsien, Central Yunnan, China

(4) Plant Microfossils from Brown Shales Found in the District of Lunan, Central Yunnan, China

(5) Some Permian plants from the Huitsch District, North-Eastern Yunnan, China

这五篇文章中有四篇使用了云南不同地区的古植物材料，对沙赫尼等印度学者的研究是一个很有益的补充。徐仁的博士论文得到了沙赫尼极为肯定的评价，两位外审专家安诺德（C. A. Arnold，美国密西根大学植物博物馆）和哈勒（T. G. Halle，瑞士植物学家）也认同此论文。1946年12月20日，沙赫尼为此特意给已经回国的徐仁发去了只有三个词（“Hearty Congratulations Doctorate”）的祝贺电报^①，纸短情长，其中包含了浓浓的欣喜之情。

1946年10月，徐仁出席了地质学会第二十二届年会在北平召开的分会，宣读了《一平浪中生代植物化石》一文。该文的摘要刊发于《华北日报》以及《地质论评》^②，徐仁对在滇西一平浪采得的植物化石进行了简要的研究描述^③。该论文的写作得益于徐仁在印度的学习和积累。

1948年，徐仁在《科学》上发表了《谈植物化石》一文（“五月十七日草于武汉大学陈华癸先生家里”）。他强调了中国古植物学家对以往地质学家们所关注的化石研究的兴趣之进步所在。^④徐仁的这篇文

① Arunabha Ghosh, “Trans-Himalayan science in mid-twentieth century China and India: Birbal Sahni, Hsu Jen, and a Pan-Asian paleobotany,” pp.239-240.

② 《地质学会论文节要（三）：第二十二届年会北平分会》，《华北日报》1946年10月28日第三版。

③ 徐仁：《一平浪中生代植物化石》，《地质论评》第11卷第5—6期，1946年，第405—406页。

④ 徐仁：《谈植物化石》，《科学》第30卷第8期，1948年，第244—247页。

章引起了斯行健的关注。斯行健在《科学》上发表了一篇《也谈植物化石》，对徐仁笔下的一些失误，进行了纠正和批评^①。斯行健表达了“科学要在求真”的态度，这种“科学只讲是非，不讲人情”的观点，无疑是值得赞同的。二人的学术论争或许给徐仁也带来了压力，但徐仁再次出国，与此事应该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因为斯行健此文正式刊发的时间是在1948年11月，已是徐仁赴印之后。

（二）徐仁第二次赴印度的主要工作

徐仁第二次赴印度的主要工作有两项。其一，协助沙赫尼教授筹办世界上第一个古植物学研究所。1949年4月3日，徐仁参与古植物研究所的奠基典礼，他与沙赫尼用植物化石制作的奠基石至今还保存着。4月9日，沙赫尼教授因心脏病突发而不幸逝世，完全打乱了研究所与徐仁的工作计划。7月23日，中国发行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还刊发了一条简讯，报导“著名印度植物学家和地质沙赫尼博士已被选为第七届国际植物学大会的名誉主席”（The well-known Indian botanist and geologist Dr. Birbal Sahni has been elected Honorary President of the 7th International Botanical Congress, to be held in Stockholm in July, 1950）^②。

在1949年沙赫尼教授去世之后，沙赫尼夫人在维持研究所的运作与建设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徐仁应她的强烈请求继续留下来工作，并以兼任副所长的身份，代为主持该研究所的所务和科研工作，甚至包括选聘人才和指导学生。徐仁为该所的建设完工和后续发展，付出了不少的心血。类似他这样在印度直接参与一个研究所的领导工作的中国科学家，还是比较罕见的。徐仁在印期间，积极参与古植物研究所的管理工作，也推荐优秀的科学家来所任职。“195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印度Birbal Sahni古植物研究所纳入技术资助计划，聘任挪威奥斯陆大学O. A. Hoeg（何霭格）教授为该所所长（聘期为：

① 斯行健：《谈植物化石》，《科学》第30卷第11期，1948年，第338—342页。

② “From Day to Day”，*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July 23, 1949, p. 3.

1951年10月—1953年8月初)”。1951年11月,来自奥斯陆(Oslo)的何霭格正式担任了该所的所长。

其二,徐仁与印度学者们开展合作研究,进行田野调研。1950年,徐仁在印度北部的穆苏里地区度假和考察。徐仁还深度参与创办该所的古植物学研究领域的英文新刊《古植物学家》(*The Palaeobotanist*)。其创刊号是纪念沙赫尼教授的专号,在1952年底由该研究所编辑出版。

李四光受沙赫尼夫人之邀在该专号上发表了英文论文《受了歪曲的亚洲大陆》(*Distortion of Continental Asia*)。该文的创作历程,恰好代表了中印科学家之间的情谊和共同追求的科学进步。1949年11月,在欧洲的李四光与夫人许淑彬计划排除阻力回到新中国,“他们在热那亚候船期间,收到女儿回信,并转来印度古植物学家萨尼的夫人给李四光的信。……他的夫人请李四光写一篇纪念萨尼的文章”^①。1949年12月25日,李四光夫妇由热那亚乘船启航回国,在漫长的旅途中,李四光完成了这篇颇具代表性的《受了歪曲的亚洲大陆》一文,以纪念沙赫尼教授。现存英文手稿共70页。^②李四光在文章开篇作了如下的陈述:

1945年秋,当作者在重庆卧病时,一天早晨,忽然接到萨尼(Sahni, B.)教授的一封信。那封信不仅表达了友谊的温暖,而且包含着对某些有希望的科学事业有启发性的暗示。它曾在不小的程度上,给予一个为生活苦恼的人恢复了兴趣。新的希望闪耀在被折磨得几乎失望的眼前。

萨尼教授在其他事情中,曾婉转地提到与传统地质学很不相同的课题,如古地磁,以期希望得到令人满意的证据,用以说明导致如印度东北的急转弯那样奇异的地壳歪曲变形的连续进程,

① 杨世铎、房树民、郑延慧:《李四光的故事》,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78年,第151页。另见许淑彬、李林《石迹耿千秋——回忆李四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第38页。又,马胜云、马兰编著:《李四光年谱》,北京:地质出版社,1999年,第183—184页。

② 该文手稿的英文版(2页)和中文版(1页),见于中国科学院档案馆编《中国著名科学家手稿珍藏档案选》,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73—75页。

这仅是他如何在广阔而未探索的领域里，用他的研究和不休止的才智探索黑暗角落的一个例子。他的鼓舞性的意见，使我想到印度作为一个大陆块，它如何在整个地质时期，曾坚强地经受了从古海域掀起的强烈构造风暴的袭击。作为在古地中海一边探索的人，我很快答应在一篇文章中，对有关事实和推论作一个尝试性的总结，并在适当的时机，赠送给我们博学的印度同行。

将近五年过去了。在整个这些年中，不可能想象，冷酷的命运却夺去一个人的科学研究，这个人过去作了很多开创新途径的工作，而在将来还可能有更多的贡献。在对未来完全不确定的情况下，作者曾经答应过的约定，现在才有机会完成，虽然这是一个悲伤的任务。萨尼教授对古植物学方面的贡献是人所共知的。在此略为介绍本文所以写作的缘由，表示我们对他的广泛兴趣的钦佩，在此虽然表达不够，似乎并非不合适的。^①

在艰难的岁月中，李四光受到了来自沙赫尼（萨尼）的问候与鼓励，感到十分温暖。为了纪念这位异国好友，李四光在归国的航船上撰文，回应了沙赫尼提出的有关印度东北为何形成急转弯的地壳变形这一问题。李四光该文中也引用了沙赫尼的一处论证，显示了不忘其学术贡献的缅怀之情。李四光与沙赫尼之间的往来，也是中印科学家交往的佳话之一。两人之间的书信也有待搜集和整理。^②

1950年12月24—26日，李四光参加了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十六年年会北京区的年会。25日下午，李四光宣读《受了歪曲的亚洲大陆》一文。^③该文的中文简版刊发于《地质论评》上^④。

① 李四光：《受了歪曲的亚洲大陆》，《地质力学概论：地质力学的方法与实践 第一篇》（第二版），北京：地质出版社，1999年，第166页。

② 相关背景可参见马胜云、马越、马进编著《李四光和他的时代：李四光书信简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

③ 夏湘蓉、王根元：《中国地质学会史（1922—1981）》，北京：地质出版社，1982年，第100—101页。

④ 李四光：《受了歪曲的亚洲大陆》，《地质论评》第16卷第1期，1951年，第1—5页。

徐仁在印度期间，与多位学者合作，发表了不少论文。他将构成自己博士学位论文第一章内容的简稿发表在《印度科学院年报》（*Proceedings of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India*）上。^①1950年，徐仁在《印度植物学会志》第一期上发表了论文《云南一平浪煤田瑞替克期植物群》，他“首先使用一平浪植物群这个专有名称”。1951年，“徐仁、K. R. Surange、Prem Singh、P. N. Srivastava、K. M. Lele和Ramanujam 从事煤的微体化石研究（microfossil investigations of coals）”^②。

1952年，“徐仁和S. N. Dube 已经对克什米尔更新世沉积物中的花粉（pollen from the Pleistocene deposits of Kashmir）进行了初步研究”^③。同年，徐仁和他指导的博士生M. N. Bose合作在《印度植物学会会刊》（*Journal of Indian Botanical Society*）发表了一篇论文。^④

徐仁在印期间，为何备受沙赫尼夫妇的青睐，被委以重任呢？除了徐仁深厚的学术积累、扎实的研究作风与敦厚质朴的为人处世之外，还因为他们学术思想上的共鸣。正如徐仁所回忆的：

我与Sahni有共同思想的就是，Sahni受英国人气，要在独立之后办一研究所，专做古植物学研究，与欧美争风，叫他们不要认为东方人不行。我也因受到列强对中国的压迫，也想争一口气。^⑤

这种思想上的共鸣不仅回应了徐仁和沙赫尼夫妇之间，也体现在其他中印科学家（或学者）之间。1946年底在巴黎举行的首届联合国教育

① J. Hsü, “Search for microfossils in the purple sandstone, Khewra”, *Proceedings of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India*. Vol.16, no.2-4, 1946, pp.92-94.

② “Birbal Sahni Institute of Palaeobotany (Lucknow)”, in *The Micropaleontologist*, Vol.6, No.1, 1952, p.19.

③ “Birbal Sahni Institute of Palaeobotany (Lucknow)”, in *The Micropaleontologist*, Vol.7, No.1, 1953, p.20.

④ J. Hsü & M. N. Bose, “Further information on *Homoxyylon rajmahalense* Sahni”, *Journal of Indian Botanical Society*, vol.31, no.1-2, 1952, pp.1-12.

⑤ 徐仁：《徐仁回忆录》，《徐仁论著选集》，第316页。

科学文化会议上，来自中印的学者就互相支持，同声相应，向国际学界发出了亚洲的呼声，积极在欧美西方把持的国际组织中争取中印的权益。1946年11月20日，在该会开幕的第一次常会上，印度代表的发言情况如下：

继请印度首席代表Radhakrishnan讲演廿分钟。R述UNESCO之目的Truth for individual & love for humanity待人以恕，持己以诚。谓世界之战争不息，由于教育制度不良。未谓UNESCO之秘书处欧美人太多，而东亚大国如印度、中国太少。^①

很明显，这是基于中印互助在国际团体发声的体现，也与战后中印声势的看涨有关。

四、徐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及其归国

（一）徐仁出席瑞典的国际会议及出访英国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殷宏章为之兴奋。在联合国任职期间，他一直密切注视着国内植物生理学的发展，常与中国驻印使馆康茅召联系，谈及国内建设情况。”^②在印度工作的殷宏章与徐仁也受到国内学者的召唤。

1950年，徐仁从印度赴瑞典参加第七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宣读了论文，报告有关泥盆纪孢子的研究，受到学界的瞩目。^③徐仁顺访了斯德哥尔摩的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等学术机构，拜访了相关的研究人员。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档案室保留了一封英国雷丁大学（The

①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十卷《日记（1946—1947）》，第255页。

② 宋立志编著：《名校精英：武汉大学、南开大学》，第158页。

③ J. Hsü, “Devonian spores from Yunnan, China”, *Proceedings on the 7th International Botanical Congress*. Stockholm, 1950.

University, Reading) 植物学家 Tom M. Harris 写给徐仁的英文打印信函, 该档案被命名为《1950年英国植物学家给徐仁先生的信》(档案编号 A002-1950-1)。该信的内容如下:

12th August, 1950

Dr. Jen Hsü
Riksmuseum
STOCKHOLM 50

Dear Hsü,

Thank you for your two letters and for the photos which we both liked.

It is good that you have been able to see good Chinese material at Stockholm. Nothing could be better. I am most interested in the cuticles and I hope before long you will publish full account of them.

In making use of them, you must allow for a certain variability in the species. When you return to London, you will be able to see many specimens of Bauera gracilis and B. furcate (Lindleyana), and both as you will see are rather varied. There are I think several specimens of B. hermelivae from Greenland with Miss Lundblad, and also of some allied species.

You must be careful of the name Czekanowskia rigida. It was used for the original material without cuticle and for many other specimens of entirely uncertain species. I distinguished two Greenland species, C. hartzi and C. nathorsti on cuticle, and Florin in 1936 described the cuticle of what he believed is true C. rigida.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species of this genus is certainly difficult. By the way, C. rigida does not as far as I know occur in England.

Podozamites lanieolatus is a leaf with an exceedingly delicate cuticle which has never been described. It is indeed not certain that it ever will be possible to prepare it properly; I have not yet succeeded. If your specimens yield good cuticles, they are certainly distinct.

Before you determine a Phoenicopsis you will no doubt consult Florin's 1936 papers! Miss Lundblad should be able to help with Pterophyllum acquale and Anomozamites minor. It will be most interesting to see your account of these and of the purely Chinese species.

Sitholey came to us today, but as he is leaving England rather soon he could not stay. We were both very glad to see him again.

With kind regards,

Yours sincerely,

Tom M. Harris^①

据孙启高介绍，Tom M. Harris是英国古植物学家，也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49年12月至1950年1月担任印度古植物所的顾问。因此，他对徐仁有一定的了解，徐仁至少给他写过两封信，两人之间建立了学术联系。此信中所提及的Sitholey即Dr. R.V. Sitholey，他于“1950年5月，被任命为所长助理，在Mrs. Savitri Sahni督导下履行所长职责”。徐仁应该就是在与Tom M. Harris联系之后，才从瑞典专程去英国访问，然后再回到印度。

（二）徐仁与中国植物学家参加印度的植物学会议及其回国

1950年10月29日，竺可桢日记：“侯学煜谈为印度科学院定于今年十一月初在德里开南亚科学史会议，明年一月初开植物会议，要请我国出席南亚科学史会议，并指明邀我出席。但为时已不及半个月，

① 另有手写签名。

我无时间预备，故决计不去（实际本年四五月已早来信，但那时我们没有理睬）。侯学煜因曾到过印度，在大吉岭一带采习（集）过，所以极愿前往。”^①

1950年11月8日，竺可桢日记：“明年一月间派人出席印度经济植物来源[会议]，东南亚派代表参加；决派陈焕镛、侯学煜二人，但是否派人与外交部商酌进行。”^②王勇忠从中国科学院档案馆中找出了两份相关的档案，分别为《关于派员参加印度南亚植物讨论会及与印度各研究所交换刊物问题的复函》（档案编号1950-04-005-07）、《关于我国应否派员出席明年一月在印召开之“南亚经济植物之来源与分布讨论会”之意见的复函》（档案编号1950-04-005-12），后者指出“印度目前对我国似欠友好的态度并不影响我国派代表出席该讨论会”^③，因此确定派代表出席该会。

1950年12月2日，竺可桢日记：“殷宏章在印度为UNESCO之Field Office之主持人，外交部欲他再留二年在印度，因为他可给我们以许多消息，院中拟复函希望殷能早返祖国，如作行政久则影响他研究工作。”^④殷宏章早已接到中国科学院回国工作的邀请，经过与新中国驻印大使馆和中科院的多方商议，在1951年结束任期之后回国工作。^⑤

1951年1月3日，竺可桢日记：“午后二点至院。侯学煜、吴征镒二人来，知今晚去印度出席南亚经济植物会议。”^⑥

1951年1月12日晨，应印度遗传育种学会邀请，中国科学院代表

①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十二卷《日记（1950—1952）》，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11页。

② 同上书，第218页。

③ 王勇忠：《中印两国的早期科技交流与交锋（1950—1966）》，《科学文化评论》第19卷第4期，2022年，第57—68页。

④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十二卷《日记（1950—1952）》，第231—232页。

⑤ 《关于是否同意殷宏章留印度的公函》，中国科学院档案馆收藏，档案编号1950-02-058-30。参见王勇忠《中印两国的早期科技交流与交锋（1950—1966）》，《科学文化评论》第19卷第4期，2022年，第59页。

⑥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十二卷《日记（1950—1952）》，第246页。

团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席“南亚经济植物的起源与分布”学术讨论会。“代表团系由广州中山大学植物研究所所长兼广西大学教授陈焕镛、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副所长吴征镒、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侯学煜和在印度勒克瑙大学教授古生物学的中国教授徐仁等四人所组成。”据新华社电文消息，本次会议于15日结束，“‘南亚经济植物的起源与分布’讨论会，系由印度植物育种与遗传学会主持，应邀参加的有中国、巴基斯坦、锡兰和马来亚的植物学者。英美和瑞典的植物学者也应邀参加。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经济植物（米、棉、茶、桐油等）的进化及其地理分布的基本问题”^①。

[新华社新德里二十六日电]我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将军十五日举行鸡尾酒会，欢宴到印度出席“南亚经济植物起源与分布”学术讨论会的我国四位代表和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最近从苏联来印度出席国际水利会议的苏联代表、印度著名的科学工作者和德里大学各学院教授，也被邀参加。

酒会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德里大学植物系主任秦纳瑞曾代表印度科学家举杯向我国大使与我国科学界代表致敬，祝贺中国、印度、苏联三国科学工作者加强团结，为争取世界和平而努力工作。印度气象局局长雷博士并表示，中印科学工作者能有各种机会接触，将能增进两国之间的友谊与合作。

此次植物学界的科学研究会议也是与当时的国际局势有关，属于当时的“争取世界和平而努力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强烈的反帝反殖民的色彩。新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的聚会之所还悬挂了毛泽东主席像和中、印地、英三语的横幅——“欢迎为新中国的建设为人民福利与世界和平的科学家”。

^① 《我科学院代表团抵新德里 参加经济植物讨论会》，《人民日报》1951年1月27日第四版。

我国代表团团长陈焕镛在会议开幕时，曾代表中国科学院向大会致词，介绍中国科学工作者在国家建设工作中的贡献，和中国科学工作者受到人民爱护和尊敬的情形，他并要求中印科学工作者加强联系密切合作。陈焕镛团长的演说，博得出席会议的各国植物学者的欢迎与赞扬。^①

有关陈焕镛在会议期间的发言，竺可桢在1951年2月1日的日记中提及了另一种情况：“昨在文教会见到电报一通，系报告政务院[有关]陈焕镛出席印度经济会议中有荒谬言论。此次派陈前往，系植物分类所主张。余告雨农，嘱其嗣后必须留意。”^②但所谓“荒谬言论”具体是指什么，目前并不清楚。很可能是指陈焕镛在一次演讲中，对印度农业弊端及其原因的批评。^③

有关该代表团在印的学术活动及其影响，不仅有与会者当时的汇报^④，还有一些个人回忆^⑤，甚至有学者多年后的总结：

讨论会结束后，代表团在印度各地访问了近30所研究机构与大学，同印度科学工作者进行了广泛接触和学术交流，介绍新中国和科学院的情况。代表团回国后，将所见所闻整理发表了《印度农业和林业研究教学机构概况》《印度植物学研究趋向》《印度一般科研情况》《印度农业的某些问题》等文章。这是建院以后，首次派出代表团到非社会主义国家参加学术会议。^⑥

① 《我国驻印大使欢宴我国及各国代表》，《人民日报》1951年1月27日第四版。

②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十二卷《日记（1950—1952）》，第282页。

③ 吴征镒：《怀念陈焕镛先生》，《百兼杂感随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

④ 《参加印度“南亚栽培植物之起源及分布”讨论会经过》，《科学通报》1951年第5期，第517页。

⑤ 比如，周鸿、吴玉：《绿色的开拓者——中国著名植物学家吴征镒》，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94年，第76—79页。胡宗刚：《华南植物研究所早期史》，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73—177页。

⑥ 樊洪业主编：《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2页。

1951年3月18日，竺可桢日记：“中午约请名词审查会在科学院中膳，到陈焕镛、夏康农、李继侗、张景钺……张龙翔等等。膳后侯学煜到寓，谈赴印度出席经过，谓印度人对于中国能出口米粮非常惊怪。谓对经济植物研究，印度胜于我国云。”^①

1951年10月19日，竺可桢日记：上午“又殷宏章来谈，知方自印度UNESCO Science Office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处回国。经Calcutta飞香港，全家六口。北大张景钺希望其留北京，但罗宗洛则自己要土改，故愿其去上海。余以北大既有罗士韦教植物生理，实际目前已不缺人，而上海植物生理所宗洛走后乏人主持，故劝其去沪”。^②10月26日，竺可桢“午后晤张景钺，谈殷宏章以两方（北大和院）合聘，本学期赴上海植物生理所”^③。

11月6日，竺可桢日记：“八点半至颁赏胡同晤罗宗洛及殷宏章。罗来京开翻译会议。殷宏章在印度为UNESCO联络员，计三年。据云印度将设立一局，专门做西文科学论文的abstract。余谓我们可以中文科学论文摘要与之对调，但全球摘要系繁重工作，年有一百八十万条之多云。又谓印度大多数科学家赞同Nehru尼赫鲁，但亦有共产党员。”^④

1952年5月2日，徐仁离开印度回归祖国。有关徐仁的回国，徐竺声的叙述如下：

新中国诞生后，他毅然舍弃优厚待遇，决心回国参加建设社会主义。于是他一边写信与李四光教授联系，一边搜集文献资料做回国准备。回国前的那几个月，正值炎热夏季，父亲常常一人在暗室里拍摄资料、冲洗胶卷，夜以继日地工作，终于将印度古

①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十二卷《日记（1950—1952）》，第308页。

② 同上书，第455页。

③ 同上书，第460页。

④ 同上书，第466页。

植物研究所收藏的整套完整的世界古植物学主要文献和标本拍成长达4000英尺的微缩胶片带回国，至今保存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①

1952年6月20日，竺可桢的日记记载：“徐仁来，渠方自印度尼沙古植物所回京。据云在印已三年多，不愿再去云。”^②徐仁的这个想法也体现在他给时任印度古植物所所长何霭格（O. A. Hoeg）的信中：“解放后的建设时期现已到来，需要科学家甚殷，科学家必须在场为国家及人民努力工作。”^③正是他的这个想法打动了何霭格，在何霭格的支持下，徐仁拒绝了沙赫尼教授夫人的苦苦挽留，甚至是印度总理尼赫鲁的热情，他回国参加新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

徐仁回国之后，被安排在南京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共同领导的古生物研究所工作。1955年1月13日，地质部致函中国科学院，提到徐仁的工作安排：

此外，在五四年借调南京古生物研究所之研究员徐仁、助理研究员宋之琛、李佩娟、助理研究员欧阳舒、技工王寿岩、汪为鑫等六人系在我部孢子花粉室工作，因工作尚在继续进行，仍需在我部工作一个时期，请予惠允继续借调。^④

徐仁回国之后，竺可桢的日记中也数次出现徐仁的身影。比如，1953年2月5日：

① 徐竺声：《回忆我的父亲》，《第四纪研究》2002年第6期，第496页。

②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十二卷《日记（1950—1952）》，第641页。

③ 《关于致外交部亚洲司关于请将中科院徐仁致印度勒克脑贝巴萨尼古植物所所长何霭格的函于中科院前函合并审核后代发印度的函》，中国科学院档案馆收藏，档案编号1951-02-039-22。参见王勇忠《中印两国的早期科技交流与交锋（1950—1966）》，第60页。

④ 《地质部致本院函》，中国科学院办公厅档案处藏，院档编号55-2-4。参见王忠俊编《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 1955年》，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95年，第6—7页。

徐仁说植物地理书。Cain, “Formulation of Plant Geography”, 1944, Minnesota U. 译自俄文 Wuff, Historical Plant Geography, 1949, Chronica, Botanica. Good, Geography of Flowering Plants”, 1948, U.S.A.。

下午曾世英、徐仁、张钰哲、赵九章来谈。^①

1955年1月19日，中科院召开第四纪地质座谈会，与会代表约八十人，包括李四光、侯德封、杨钟健、徐仁等人。^②

1963年3月20日，竺可桢“在温泉遇徐仁，知其全部时间在北京植物所，于两月前来云南调查，适遇大雪致发寒热转成Rheumatism，因来此休养云”^③。

余 论

有关徐仁赴印的经历，高天刚、牛帼豪老师2023年6月12日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档案室中，抄录了如下的徐仁资料：

1945年在印度拉克脑大学获得金质奖章。

1940.8—1943.7，云南大学生物系 付教授

1943.8—1946.5，印度拉克脑大学研究员

1946.8—1948.9，北大生物系及地质系 付教授

1948.11—1952.5，印度古植物研究所 教授兼博物馆主任
(后改为付所长)

①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十三卷《日记（1953—1954）》，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5页。

②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十四卷《日记（1955—1957）》，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3页。

③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十六卷《日记（1961—1963）》，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474页。

1952.7—1954.7, 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 研究员(南京)
印度植物学会[会员]

1946年, 中国云南路南大村泥盆纪微植物化石(博士论文一部分)

1946年, 中国云南中部泥盆纪孢子(博士论文一部分)

上述的一些时间节点并不完全准确, 比如, 1943年8月, 徐仁尚未抵达印度, 还算不上是正式的“拉克脑大学研究员”。不过, 此时间点也印证徐仁首次办理赴印手续是拖延许久的。徐仁的两次赴印, 个人色彩比较强, 而政府资助(官方色彩)较弱。在这一点上他不如柯俊, 后者是国民政府直接委派赴印任职的。

作为一名有潜力的年轻学者, 徐仁1944年春赴印度勒克瑙大学, 师从沙赫尼教授, 从事研究。与尚未进入学术殿堂而刚起步的一般博士生不同, 徐仁在印度的研究实际是更多与沙赫尼等人的合作。1946年, 徐仁以博士学位论文《古植物学之贡献》(*Contribution to Palaeobotany*)获得勒克瑙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 并被该大学授予金奖。

徐仁参与了沙赫尼古植物研究所的创建工作。他与沙赫尼教授的合作在近代中印科技与人文交流方面堪称典范。1946年底, 徐仁回国不久就再度获得沙赫尼教授邀请, 到印度合作创办古植物研究所。虽然张景钺劝他继续在北大工作, 但他还是在1948年10月携家眷抵印, 开启第二段的合作研究之旅。

1951年, 徐仁通过参与印度的“南亚栽培植物之起源及分布”会议, 更多了解了国内科学事业的起飞趋势, 愉快接受周恩来总理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的邀请, 同时也感觉到印度人的政治隔膜以及印度警察与特务的监视^①, 他毅然于次年回到了祖国, 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

^① 徐仁:《徐仁回忆录》,《徐仁著作选集》,第317页。

徐仁回国后长期从事古植物学和孢粉学的教研工作，为我国的科学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80年他荣膺中国科学院院士。徐仁被誉为“世界古植物学及孢粉学权威之一”和“中国古孢粉学研究创建人”，他所取得的巨大学术成就，既离不开中国学术前辈的培养和自己的长期不懈努力，也不能忽视他在印度近六年时间内从沙赫尼教授及其同事们那里所受的无穷教益。

与此同时，我们同样不能忘记，徐仁在印度期间，不仅“研究中国云南泥盆纪植物，并对微体古植物学进行了先驱性的研究”，对印度学界起到很好的示范与补充；而且参与筹建古植物研究所，在沙赫尼教授不幸去世之后，还挑起了该研究所的大梁，参与创办学术刊物《古植物学家》，并担任过“古植物学研究所博物馆主任”和研究所的副所长，领导印度的科学团队，为印度古植物所指导培养出了第一位博士玻色（M. N. Bose）等高端人才。徐仁当时虽还不算是中国的顶级科学家，但他的这些作为在中国近现代赴印留学史上也是较为罕见的。徐仁在印度的工作，被人称为“功绩甚为卓著，在整理收藏品及鉴定登记标本方面贡献甚大且有永久价值”^①。徐仁还被遴选为印度植物学会理事、印度古植物学会名誉会员。这充分说明印度科学界对徐仁的学术成就的认同。由此我们看到了近代中印文化与科学交流的“双向性”，即你来我往，双赢互益，这与古代印度佛教流传中国的单向影响是截然不同的。

徐仁能有缘到沙赫尼教授门下受教与合作，也得益于沙赫尼从1930年代初就开始与中国科学家们的交往。在将近20年的来往中，沙赫尼与张景钺、李四光、斯行健、翁文灏，应该说不仅缔结了友谊，还共同探讨了学术问题，为建构新时代的亚洲独立格局，特别是为科学、教育、文化方面的崛起和自信，做出了非常重要的努力。

沙赫尼与徐仁的交往不宜单纯视为两人之间的事情，而应该将其

① 参见王勇忠《中印两国的早期科技交流与交锋（1950—1966）》，第60页。

放在中印交往乃至当时东西方的关系网络中，从更广阔的角度去思考和揭示其所蕴含的时代意义。就大势而言，抗战期间的中印科技文化交流活动，远比我们印象中的要丰富和复杂得多。不仅中印高校的学者有所往来，而且地方上的科技与医疗的管理或从业人员，也参与到此类交流活动之中。比如，1944年3月21日，胡先骕在位于江西的中正大学“主持全校纪念周，邀请江西省卫生处长方积颐讲演赴印度观感”^①。据目前学界的一般看法，抗战时期的印度类似于中国的大后方，在多方面为中国提供了巨大的支持。抗战胜利之后，中印双方的来往比以往要更密切一些。当然，就双方的交流而言，并不仅仅是中国单向受益，而是中印双方当时大体存在双赢的心态和做法，双方往来互助，也就产生了互惠的效果。比如，1946年7月2日，胡先骕致函夏纬琨（玉峰）：

接印度 B. A. Ragi 来函，索取骕所著“The Characterization and Affinities of the Chinese Flora”一文之单行本，可在骕住室中检出，航空寄 35 Ballyganj Ciacedar Rd., Calcutta, India, 至以为要。^②

从邮寄地址（正确写法为：35 Ballygunge Circular Rd. Calcutta）来看，B. A. Ragi 应该是加尔各答大学（University of Calcutta）的教师。他向胡先骕索取植物学论文，胡先骕很乐意安排寄送论文给对方。1947年，北京大学致函驻印大使罗志希（罗家伦），表达对印度地质调查局赠书的感谢^③，这也是当时中印科技交流的活动之一。

1944年3月29日，竺可桢“至中印学会晤朱君，向其借阅 Cultural Heritage of India《印度之文化传统》，Vol.III, 其中 pp.341,378 有 Sengupta, Prof. Calcutta University, Hindu Astronomy《印度天文学》一

^① 胡宗刚：《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52页。

^② 同上书，第392页。

^③ 《北大感谢印度地质调查局所赠古生物志的函》，北京大学档案馆藏，档案编号BD1947264。

文。认古代Brahmai经典中所述冬至位置在年终，月望在Phalguni，而在春季开始月在Chaitra，故知夏至点过 δ 狮子座，因以推得其年代为3100BC。其余尚有六种同类证明，足知其年代在1900BC至2850BC云云”^①。

竺可桢从“朱君”（中印学会总干事朱延丰）那里借阅《印度之文化传统》，从而读到了Sengupta教授的文章。朱延丰是清华毕业生，曾受业于陈寅恪先生，任职中印学会多年。^②竺可桢对中国二十八宿的起源问题甚有兴趣，他翻遍中国古籍，并参考印度、日本等国学者的论文，撰成长文《二十八宿起源的时代与地点》。据说这是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期间，撰写的唯一一篇科学论文，可见此文在他心中的意义。1947年初，竺可桢在美国《大众天文学》杂志上，发表了英文论文《天文学中二十八宿之起源》，但显然仍意犹未尽，1948年11月5日，竺可桢又“午后作函与印度Calcutta加尔各答大学Sengupta教授，询印度廿八宿事”^③。可见竺可桢对此问题的真相一直探究不止。

或谓印度的部分科学家（或学者）对与中国同行交流颇感兴趣，与“泛亚洲主义”思想有关。不过，当时中印科学家之间的往来中，较少使用类似的概念或者想法。陈省身致函梅贻琦校长时，就有很恰当的描述：

月涵校长先生道鉴：

生于七月十五日离昆，迄今已月余，谨将途中及到美后经过，择要略陈左右。到加尔各答后即往见该校数学教授Levi先生（印

①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九卷《日记（1944—1945）》，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3页。

② 1944年3月4日，夏鼐“上午至中印学会，晤及朱延丰君”（夏鼐《夏鼐日记》第三卷〔1942—1945〕，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2页）。又，3月16日，夏鼐“赴中印学会，托李先生向朱先生催促筹划经费”（同前，第165页）。

③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十一卷《日记（1948—1949）》，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49页。

度学制与英国相同，每系只一教授)，氏系德籍犹太人，与汉堡若干士，均曾相识，故一切甚顺利。在加共住两星期，计在加大讲演四次，题目为Theory of Geometric Objects and the Method of Equivalence,内容大都为年来工作结果。另在加城数学会讲演一次。加大设备甚好，足敷工作之用，如研究已有经验，尽可利用，实际上与在英差不多。讲演毕后，Hyderabad, Madras, Allahabad等校均有邀请，惜因飞机优先权事美方已有复电，不便多留，遂予婉却。大约印人心理颇愿与中国有若干来往，但希望为中印的关系，而非中英的。若我国科学家如能在印作较长之停留，亦是增进中印关系之一道。……^①

所谓“为中印的关系，而非中英的”，正好表明了印度学者的心中所想。这也是印方学者推动中印交流的心理基础，乃是从现实的国际政治局势出发。徐仁的两赴天竺也恰如陈省身所说的“在印作较长之停留”，确实“是增进中印关系之一道”。

即便在沙赫尼不幸逝世之后，他的学术和所关注的问题，仍然没有被中国同行们遗忘。1950年5月27日，斯行健致函李四光，讨论《北满木化石》一文所涉及的内容。其中提到：“贼木（Phoroxylon）一属，甚为奇特。二十年前Sahni教授曾发表印度侏罗纪初期之木化石Homoxylon rajamahalsense n.g. sp.一文，颇受植物学界注意。”^②1969年，中国科学家组团进行珠穆朗玛峰地区的科学考察，其中的古植物化石得到了徐仁的关注。1973年，徐仁发表了《西藏南部珠穆朗玛峰地区植物化石的发现及其意义》一文，主要分析了习见舌羊齿等来自珠穆朗玛峰地区的三种植物化石，进一步支持了沙赫尼教

① 《陈省身函梅贻琦报告赴美研究情况》，清华大学档案。此据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4·教职员卷》，第458—460页。

② 马胜云、马越、马进编著：《李四光和他的时代：李四光书信筒集》，第137页。原书中的Sahni误作Sami，今统一改正。

授有关甘瓦纳古陆的说法。^①

考虑到近现代中印科技文化交流与人员流动的双向性，特别是徐仁这类留学印度但又为印度古植物学研究做出贡献的人物，值得表彰，而不应被历史所遗忘。更有意义的是，徐仁两赴天竺，受益的不仅是当时的双方，也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印的古植物学研究的深度合作埋下了伏笔，奠定了基础。比如，1983—1984年，杜乃正沿着徐仁的足迹赴印度沙赫尼古植物所，在普拉卡什（U. Praksh）指导下获得了博士学位^②。此后，中印科学家合作首次揭示植物迁移与喜马拉雅山抬升关系，这样的合作成为了一段难得的佳话。因此，虽然目前中印两国的地缘政治关系非常复杂和棘手，但政治是暂时的，文化是长久的。中印的文化交流仍将沿着两千多年来双方的前贤们留下的足迹，不断向前迈进，进一步增强理解和互惠互利。

① 徐仁：《西藏南部珠穆朗玛峰地区植物化石的发现及其意义》，《植物学报》第15卷第2期，1973年，第254—258页+图版2页。

② 孙启高编著：《古植物学简史与我们的使命》，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1页。